

全球价值链重构新趋势 与中国产业链升级路径

文 / 沈铭辉 李天国

摘要：受新技术革命、大国竞争与博弈以及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全球价值链呈现出重构的态势。数字化、短链化、区域化、友邻化、绿色化、服务化成为当前全球价值链调整的重要特征和新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发展模式转变，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国要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兴产业；借助 RCEP 合作框架，加强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体系；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以高水平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价值链升级；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价值链联动，不断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重构；东亚区域价值链；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23)02-0070-09

70

2023. 2

全球价值链是国际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近些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进程不断加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面对美国的“小院高墙”和“友岸外包”的政策，中国要进一步提升价值链水平，强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这将有助于中国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归纳短链化、区域化、友邻化等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六大新趋势，分析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三大主要因素，提出借助《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加强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等中国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应对策略路径。

一 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六大新趋势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赶超传统发达国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在相对自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中美竞争和美国选举政治的中国与美国各州贸易关系研究”(20BGJ057)

作者简介：沈铭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市，100007；李天国，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北京市，100007。

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背景下，全球价值链迅速扩张与延伸，多边贸易机制与区域一体化浪潮不断为全球的货物与资本开拓更多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演进为国际贸易带来了活力，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经济全球化在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主要涉及全球价值链的技术研发与设计部分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参与到价值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这样的分工与合作必然导致了经济全球化的不均衡后果。从发达国家来看，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度演进，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海外转移导致了国内产业“空心化”，其国内曾吸纳大量产业工人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大幅下降，导致了一些产业工人失业，加剧了社会部分群体的贫穷。另外，在市场开放情况下，社会资源不断向优势行业集聚，相关从业人员成了最大受益者，而相比之下，某些弱势传统行业则不断被边缘化。当经济快速增长时，这些矛盾往往会被掩盖，但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或受到外部冲击时，这些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并未有效地缩小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容易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环节，制约其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的迈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发达国家贸易额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下滑，一些发达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始不断质疑经济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声音高涨。以美国特朗普大选获胜、英国脱欧为标志，围绕反全球化的争议进一步升级。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大张旗鼓地采取单边主义做法，对原有的国际经贸秩序构成严重挑战。美国把本国的实力下降归结为中国的平等竞争，并把中国视为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最大威胁。^[1]

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让很多国家和地区采取封锁国界与限制人员、货物的流动，而这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较大风险。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危机与此前的既有分歧产生叠加作用，进一步加快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进程。部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调整以往制造外

包的公司战略，重塑全球价值链版图，扩大对本国或邻近地区生产线的投资。另外，数字智能制造的生产方式也进一步强化了工业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劳动力成本在企业生产与经营成本中的比例大幅下降。如果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能及时调整策略，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形势，将面临进一步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局面。

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趋势。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幅改变了传统制造模式。数字要素、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有望打破现有国际分工体系的技术边界，为制造业带来根本性变革。智能制造涉及装备智能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现代化、营销服务网格化等技术，实现设备与设备、设备与工厂、工厂与工厂之间以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无缝连接。智能制造方式下，生产系统不再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是通过智能系统控制，完成对生产过程的自我检测与调控，实现系统性控制，重新整合产品价值链系统。^[2]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变革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原有技术关系、商业模式以及组织结构，以信息技术创新为核心，由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组成新技术群，并催生出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业态。供应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正在让企业的资产趋向轻量化，让价值链管理变得更加智能，为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带来重大机遇。

第二，全球价值链的短链化趋势。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价值链条的收缩。事实上，国际分工细化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价值链不可能无限拓展。随着技术的革新，相比国内生产环节，价值链的国际生产环节在不少年份都在缩短。另外，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让不少国家担心供应链和价值链条的断裂可能会威胁到产业生产的安全。为了保障产业链安全，不少国家改变原有基于市场分工效率的价值链布局，收缩原有的价值链条，推动价值链的回流。

第三，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化趋势。不少发达国家认为，无论是从价值链的前向关联角度，

还是从后向关联角度看，区域内的关联度重要性明显高于区域外关联度。^[3] 这些政策举措，无疑将加速全球价值链的区域布局，并朝着区域化方向发展。^[4] 客观上，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各种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这种区域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区域经贸安排大幅提升了区域国家之间合作的活力与效率。区域内的制度和技术驱动型直接投资部分取代了全球范围的成本和效率驱动型跨国投资。^[5] 新技术的发展也让很多制造流程愈发摆脱劳动力成本限制，越来越聚集在特定区域实现分工与合作，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中的价值链变化更加明显。

第四，全球价值链的友邻化趋势。新冠疫情让发达国家更加深刻意识到现有全球价值链的局限性，供应链安全成为西方跨国公司供应链管理的主要目标。例如，为了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确保本国供应链安全，美国试图与盟友和伙伴国重新组建区域价值链体系。美国国防部发起“国防伙伴关系计划”，与加拿大、英国、法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还通过“经济繁荣网络计划”构建供应链弹性联盟，改变价值链关联，深化与同盟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

第五，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趋势。在碳中和背景下，像水泥、建材、有色、化工等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不得不实施脱碳化改造，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产业迎来广阔发展前景。国际分工体系向绿色化发展，碳市场和交易机制将强化价值链的重构，欧盟计划实施的碳边界调节机制（CBAM）预示着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重构即将步入正轨。美国深知能源地缘政治的供应链权力逻辑，试图通过绿色供应链改变全球权力分配和国家间关系，进而重塑未来地缘政治经济版图。美国正不断加强绿色供应链盟友体系建设，而中美在制度标准和关键资源等问题上的竞争愈发加剧。

第六，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化趋势。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不仅发生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领域也非常明显，特别是近年来制造业贸易强度在降低，而服务业贸易强度在提高。当前，全球服务贸易正以远高于货物贸易的速度快速发

展，特别是网络服务与商业服务领域增长速度尤为引起关注。产品的升级和技术复杂程度与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技术的复杂度往往伴随着服务投入的增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服务收入弹性超过货物商品收入弹性。从产品的研发、营销，再到财务和人力资源投入等环节，服务业的价值创造渗透到物质产品的每个不同生产环节，构成非常重要的中间投入，不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也推动了企业的产品向差异化和深度化发展。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外形设计与研发等环节拓展产品价值链上游渠道，不断为产品赋予新的价值，推动产业的生产要素从有形实物向无形服务进行转变。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不断向产品的售后服务等价值链下游环节延伸，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拓宽营销路径，加强对消费者的服务，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来转化生产模式。^[6] 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服务成为重要的产品增值来源，并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纳入到生产制造过程，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服务化趋势。

二 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三大主要因素

影响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因素大致可以归为三类：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大国竞争与博弈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这些不同因素相互影响和交叉叠加，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影响方式和效应，将对现有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

新技术一直是推动全球产业结构与产业转移的根本推动力。技术的进步不仅加快了世界范围内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同时也改变着生产方式与全球市场的要素配置。技术进步推动全球价值链分解成独立的价值环节，呈现出专业化与模块化趋势，进而表现为产业模块化发展与企业专业化生产。全球价值链分解后，不断细化并重新组合，打破了原有的生产工序边界，对整体产业带来深刻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价值链不断经过试错重新形成新的价值链环节，并不断向前演进与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催生出很多新兴产业，并不断冲破产业规模经济的边界，大幅降低生产成

本,改变了原有产业劳动力投入需求。新兴产业不再依据劳动力成本并大规模投资于发展中国家,而是通过提高全球价值链构成中的知识密集度,重新塑造全球价值链布局。随着新技术发展,生产车间的工人不断被智能机器所替代,使得跨国公司不再受到劳动力价格限制,把公司迁移到更加靠近消费环节的地方。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因不再围绕劳动力成本展开,新兴产业对劳动力成本的需求进一步下降。新兴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不断缩短,甚至经过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与改造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部分生产链条也重新布局到发达国家。对于长期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趋势不仅会导致本国传统比较优势的弱化,同时还引发了产业转移的冲击。

(二) 大国竞争与博弈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面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经贸秩序并未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美国肆意动用各种贸易与投资限制措施向中国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发起关税制裁,严重威胁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加,拖累了全球经济的复苏步伐。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不断通过符合自身利益的经贸规则和做法,例如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为代表的排他性制度安排,侵蚀经济全球化时代投资与贸易自由化成果,损害了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美国发布的供应链安全评估报告要求对抗或遏制已经形成的供应链节点国家的控制力,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供应链“去中国化”的战略意图。美国采取这种“去中国化”的战略背后是此消彼长的中美经济实力的变化。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中国的地位日益上升,相对地削弱了美国在区域以及全球价值链上的影响力,客观上对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性地位构成了威胁,由此中国便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去中国化”战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手段。

目前,全球存在北美、欧洲和以中国为核

心的东亚地区等三大价值链网络,美国希望通过从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重塑全球价值链,以实现对华价值链从“脱钩”转向“拆解”的目标。在双边层面,美国的“去中国化”战略与全球价值链重塑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向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惩罚性高关税,限制双边经贸合作。美国为延缓中国经济发展,针对中国向美国出口量最大的机械设备征收高关税,使得双边经贸关系“脱钩”。二是对中国企业实施投资限制,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外国投资的审查范围和管辖权限,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审查并限制关键核心技术或战略性物资的对华出口,构建针对高技术的“部分脱钩”局面。三是采取更加机制化和多样化的方式,引导制造业回流至本国。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基于政治目的而排斥国际合作,将新冠疫情的发生、传播和防控演变成一场“叙事”之争,这导致国际社会很难齐心协力抗击疫情。

在区域层面,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以下简称“美墨加协定”)为例。该协定取代了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仅进一步提高了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数字贸易、劳工、环境等方面的标准,更罕见地引入了极具排他性的毒丸条款。该协定规定,如果三个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则其他成员国则有权退出“美墨加协定”。该协议还新增了汽车免税门槛条件,即整车必须达到40%~45%以上由三国工人生产,且整车中的某些关键零部件必须由三国生产。该协议推动了原有北美汽车价值链网络,未来还可能向更高端的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扩散,使全球价值链的重塑朝着美国掌控的方向发展。^[7]

在全球层面,美国宣布“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企图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韩国等同盟国家重组全球价值链,以减轻对中国的依赖。美国也拉拢欧洲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建立所谓的半导体联盟,封堵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本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量价值链的掌控能力。美国以国内法取代世界贸易组织的贸

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做法,背离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降低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效率。但是自多哈回合谈判以来,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无法解决全球贸易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迫在眉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感到对现有多边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全球贸易壁垒与贸易制裁增加的情况下,中间品供应与最终产品消费本地偏好使得全球价值链的延展进一步受到影响,客观上对全球价值链的扩展起到抑制作用。

(三) 新冠疫情的冲击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世界经济增长受到重创,遭遇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世界经济大幅下滑3.3%,全球货物贸易量下滑5.3%,全球金融市场也出现剧烈波动,以美股为代表的多国股市出现熔断,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尽管新冠疫情暴发距今已过三年,但世界经济仍然增长缓慢,美欧等国家通货膨胀率还处在40年以来的高位,各种危机和不确定性仍然阻碍着世界经济复苏,高通胀和低增长仍然将成为2023年世界经济的基本态势。

新冠疫情也对国际供应链物流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国际海运和空运规模出现大幅缩减,大幅抬高了进口货物的价格,不少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此外,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扩散,世界各国在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采取的封控措施,限制了货物与人员的跨境流动,这也是导致国际贸易成本上升的原因之一。由于生产所需物资与劳动力无法及时投入生产,世界各地出现不同程度的产业链供应链断链现象,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方式暴露出其脆弱性。新冠疫情造成的失业和经济动荡也加剧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浪潮。根据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构建的全球化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形式在常态下能够发挥明显优势,但遇到重大突发外部冲击的干扰时,通过中间品贸易而实现紧密关联的复杂产品价值链受到破坏,凸显出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面对供应链安全威胁,提高供应链韧性成为跨国公司的重要应对策略。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调整本国的全球价值链布局。对

全球供应链体系依赖度较高的跨国企业纷纷从“成本与效率优先”的战略转向“效率与安全平衡”的战略,选择从更多的地区采购中间品以避免对某一国家的过度依赖。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一些国家和地区感到无法仅凭自身力量抵御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双向冲击,于是更加倾向于选择加入区域组织,借此维护自身利益和降低风险,这也客观上推动了区域价值链的发展。^[8]

三 东亚地区价值链重构下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机遇与挑战

东亚地区价值链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体系的重要渠道。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凭借东亚地区价值链,逐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利用自身熟练劳动力优势以及制造业生产能力等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今,东亚地区依然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新形势下,东亚地区价值链重构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稳定和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东亚生产网络作为与欧洲、北美并肩的世界三大生产网络之一,拥有比较完备且密集的价值链。20世纪80年代,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其生产网络结构以日本与这些经济体建立的供应链为主。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泰国与中国台湾加入到核心队伍,并与日本核心零部件厂商建立密切的价值链关系,逐步形成由东亚各国或地区分别从日本引进资本品后销往欧美市场的“三角贸易”模式。20世纪末,中国也被纳入东亚生产网络,并逐步与日本、韩国成为该生产网络的最核心国家,贸易模式也转向东亚经济体向中国出口中间品,由中国完成产品的最终组装与生产后,再把产品出口到欧美市场的“新三角贸易”模式。东亚生产网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中间品贸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1995—2009年亚洲中间品出口增长速度为7.2%,远高于4.8%的世界平均水平。近些年,随着中国技术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不断向东亚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在此过程中,东亚的“雁阵模式”开始解体,新的区域分工模式呼之欲出。

在东亚地区价值链重塑背景下，东亚经济体都在调整自身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角色与地位，形成更紧密的东亚区域贸易网络和产业分工体系，为中国与区域经济合作创造有利环境。

第一，助推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形成更紧密的东亚区域贸易网络和产业分工体系。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全面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很快就成为东亚价值链体系中的核心环节。中国的制造业技术含量迅速提升，在制造业的创新能力和产业规模、集聚效应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2012年以来，中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0%，在原材料工业占比达15%；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2年位居世界首位，已成为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齐全的国家，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所有工业门类；已形成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代表的新材料产业聚集区，新材料领域培育了4个先进制造业集群、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19个创新型产业集群、96个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国的制造业正从以低附加值生产为主向高附加值生产为主转型升级。中国不再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大量承接来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加工组装环节，而是通过技术创新，转向技术设计与材料研发。中国的供应链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也得到大幅增强，可以为全球各国提供便捷的生产与服务。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实力的下降，而是中国逐渐变成以创新为主、具有更高附加值的全球制造中心。^[9]

第二，助推中国从外需和投资为主转向内需和消费为主的战略转型，取代美国成为东亚最重要的最终消费市场。2012—2021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率都保持在6%以上，远远高于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且总量也位于世界第二位。^[10] 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万亿元，同比增长12.5%，是2012年的2.1倍。当前，消费已经超过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消费“主引擎”动力强劲，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撑。随着中国最终消费市

场的扩大，东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面向欧美市场的销售环节将转向中国。东亚经济也将从域外需求为主转向域内外需求均衡发展，区域内经济循环将更加变强。东亚价值链最终或摆脱以往严重依赖欧美等域外消费市场的局面，走向一种内需与外需、生产与消费更加均衡的发展模式。

虽然东亚地区价值链重塑强化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给中国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产业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但同时也给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一定挑战。

第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使部分经济体实施产业回流政策。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国内劳动力成本也在持续上升，使得日本与韩国等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开始把部分生产工厂转移至东南亚地区。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对东亚区域价值链供给端与需求端均造成严重冲击，一些产业，如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中间品供给受到影响。2020年4月，日本颁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总额达108万亿日元，其中专门调拨2200亿日元用于资助日本企业将海外生产线转移至国内或实施供应链多元化战略。该经济刺激计划通过财务方面的援助，帮助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国家建设生产设施进行可行性研究，从而实现企业供应链多元化。此外，韩国政府也发布了类似政策措施，帮助本国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自2014年韩国颁布实施《海外企业回流法》以来，截至2021年，共有108家韩国企业回流至本国，分别涉及汽车、电子、机械、金属、化学等行业。新冠疫情暴发后，韩国政府于2020年3月1日修订海外投资企业回归国内支持相关法律。2020年4月1日，韩国又修订和实施“材料、部件、装备特别法”，2020年7月颁布“材料、部件、装备2.0战略”等，确保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同时，应对海外的本国产业回流态势。

第二，美国借机拉拢部分经济体，企图打造所谓基于价值观的高新技术产业供应链网络。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授权贸易代表审查中国贸易行为，宣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存在不公平现象，要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知识产权

和技术创新等领域调查,并于2018年宣布对超过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收受惩罚性关税,涵盖了生物医药、通信、电子、航空等多个高新技术领域。^[11]美国开始从金融、投资、人员交往等各方面频繁施压,将中国部分高科技企业列入“实体清单”进行单边制裁。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取消或减少所谓惩罚性关税,反而不断增加和扩大对中国企业等实体制裁的各种清单等。美国宣布实施“印太战略”,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打造多层次全覆盖的战略合作关系,以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加强与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政策协调,意图在半导体芯片等领域打造以美国为主的供应链网络。2022年,美国推出“印太经济框架”与“芯片四方联盟”,企图干扰东亚经济体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打造一个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对抗性的经济合作安排。美国的政策举动对东亚价值链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四 推动中国产业链价值链升级的重点路径

当前,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对中国产业发展既构成了挑战,也形成了重要发展窗口期。中国要顺应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分工演进发展趋势,抓住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升级。

(一) 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兴产业

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全球竞争格局形势,加快实施产业链补短板、锻造长板工程。加强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协同创新与深度融合,结合国家科技创新重点,加快基础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效,补齐在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等少数关键领域的短板,重点突破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高端半导体芯片等重点产业技术环节,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供应链安全。加强政府的顶层设计,以技术创新体系再造为着力点,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为自主创新技术的研发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定和实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规划,完善支持国际协

同创新的政策,通过内外协同创新,持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助推中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位置。^[12]加快新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动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步伐。抓住重要发展机遇与窗口期,系统谋划、前瞻布局,发挥投资的引导作用,优化供给结构,增强产业链应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扩大对供应链的关键领域的有效投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夯实价值链升级的基础设施。顺应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构建智能化制造系统,重塑制造业转型发展新模式。^[13]

(二) 利用 RCEP 合作框架,加强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

要充分释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带来的制度红利,强化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地位,提升对产业链的控制力。中日韩三国在制造业领域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具有较长历史基础,从原材料和零部件到中间品的生产与供应关系密切,外部经济冲击更容易使中日韩三国形成协同合作关系。^[14]中日韩三国要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在经济大循环中畅通中日韩小循环,增强维护区域价值链稳定发展的力量。利用 RCEP 对区域内生产环节进行优化布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掌控研发设计、生产性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向“世界创新中心”转变升级。^[15]以全面创新和综合改革试验区为重点,加快建设投资贸易便利、营商环境优越、高效安全监管的高水平自由贸易示范区,优化或整合自由贸易协定服务,为高标准市场开放做好示范工作。^[16]加强国内企业在 RCEP 框架下与成员国开展产能合作,有效利用区域资源,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布局全球中高端价值链,高质量实施 701 条约束性义务并积极探索实施 170 条软性义务,提高中国企业在 RCEP 区域内的嵌入水平,强化与成员国所构成的价值链体系的韧性与安全性。

(三)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体系

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

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加快布局全球产业链,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深度经贸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探索形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机制,通过相互价值融合,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作为导向,致力于满足沿线国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推动与不同沿线国家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在将更多国家纳入国际分工体系。这种合作模式更加注重不同合作对象的异质性,根据不同要素禀赋特征,通过差异化战略开展制造业产业合作。支持具备技术与产能的国内链主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我国企业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推进国内产业链的国际拓展与延伸,并逐步向更高水平的全球价值链攀升。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境外高标准产业园区,积极引进国际高端创新资源,加快形成高科技产业链,扩大关键环节的产能供应,拓展产业链和创新链网络。

(四) 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以高水平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价值链升级

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效利用并主动加速以价值链区域化为特点的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进一步削减国内区域间政策性壁垒,充分发挥中国在制造业中的本土市场效应。中国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以扩大内需为中国全球价值链战略基点,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发展动力。^[17]进一步发挥消费对价值链升级的重要作用,要加强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充分运用数字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打通阻碍产业链供应链的断点和堵点,提升供应链韧性,使现代流通体系运行更顺畅。合理优化配置资源,实现国内市场的高效联通以及供需良性互动,畅通国内国际价值链的战略链接,推动中国制造业价值

链更深融入全球价值链。

(五) 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价值链联动,不断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当前,中国在部分制造业领域仍面临着“技术瓶颈”,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有待于进一步突破。面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压,要强化与全球价值链的相互依存性,通过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来应对一些国家的“去中国化”态势。无论何时,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价值链关联与合作都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产业关系的重要部分,中国在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等方面仍需要与发达国家密切交往与合作。要积极开展全球价值链领域的国际产业政策交流,与相关经济体开展全球价值链经济技术合作,开发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项目。一方面,通过市场开放与制度创新,提升国内的营商环境质量,更多地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技术资源,让中国企业在各行业各领域与全球最优秀的企业展开激烈竞争。鼓励外国资本的研发成果在国内使用和转让,鼓励外国资本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另一方面,要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按照国际规则并购、合资、参股国外创新型企业和研发机构,提高海外知识产权运营能力,通过不断学习、借鉴和研发先进生产技术,进而突破美国的围堵与打压,提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 [1] 李向阳:《特朗普政府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
- [2] 杜传忠、杜新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经济纵横》2017年第4期。
- [3] 张二震、戴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新趋向及其对策》,《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10期。
- [4] 盛朝迅:《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思路与策略》,《改革》2021年第2期。
- [5] 杨丹辉、渠慎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及国际生产体系调整方向》,《经济纵横》2021年第3期。

[6] 祝树金、王哲伦、王梓瑄:《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制造业服务化》,《国际商务研究》2021年第3期。

[7] 李括:《美国科技霸权中的人工智能优势及对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国际关系研究》2020年第1期。

[8] 屠新泉:《“一带一路”建设、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的应对》,《当代世界》2022年第6期。

[9] 刘洪钟:《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景——以东亚价值链结构变动为视角》,《学术前沿》2021年第5期。

[10] 张辉、吴尚、陈昱:《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动力及中国应对》,《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11] 曲越、秦晓钰、黄海刚、夏友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产业与经济的影响——以2018年美国对华301调查报告为例》,《中国科技论坛》2018年第5期。

[12] 石建勋、卢丹宁、徐玲:《第四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与中国产业链升级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

[13] 徐建伟:《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新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宏观经济管理》2022年第6期。

[14] 李天国、沈铭辉:《疫情危机下东亚生产网络协调机制与合作策略》,《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15] 陶涛,朱子阳:《RCEP、区域生产网络重构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新视野》2021年第5期。

[16] 王跃生、杨丽花:《区域贸易协定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

[17] 王跃生、刘丁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改革》2022年第10期。

责任编辑 马相东

(上接第59页)

[16] 刘铮:《中国人口学研究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人口研究》1990年第6期。

[17] 陆杰华、肖周燕:《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口学发展——回顾、评述与展望》,《人口学刊》2010年第1期。

[18] 宋健:《近10年来中国人口学方法发展回顾》,《中国人口科学》2018年第6期。

[19] 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0] 陆杰华、刘芹:《人口发展转向背景下中国人口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及其展望》,《人口学刊》2019年第3期。

[21] 石智雷、吕婕:《全面二孩政策与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变动》,《人口研究》2021年第2期。

[22] 杨成钢、闫东东:《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人口学刊》2017年第5期。

[23] 韩喜平、郝婧智:《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1年第4期。

[24] 罗红杰:《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实践、超越逻辑及其世界意义》,《经济学家》2021年第12期。

[25] 韩喜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与路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26] 郭沧萍:《人口学在21世纪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人口研究》2002年第1期。

[27] 尤丹珍、陆杰华:《1999:中国人口学研究回顾与评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28] 蒋正华:《中国分区模型生命表》,《中国人口科学》1990年第2期。

[29] 徐伟轩、吴海江:《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使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10月27日,第3版。

[30] 冯立天:《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年第6期。

责任编辑 刘秀秀